



## 《資治通鑑》所載諷諫之唐詩

● 施寬文\*

因為預設讀者為帝王、政治高層，並以提供政治、軍事、經濟之「資鑑法戒」為主要編撰目的，因此全書大約三百萬字的《資治通鑑》，對於歷代知名之哲人、文人並未有所著墨，其人膾炙人口之作品也因此多未載入，前人對此有所質疑，如宋人劉義仲，也有所解答，如元人馬端臨，以及明人顧炎武<sup>1</sup>，此處不贅。

雖然《資治通鑑》幾乎不載文人及其作品，但是並非全然闕如，其中，《詩經》因屬「五經」之一，地位特殊，古人不似今人視為文學作品，歷代政治人物引詩以諫者眾，故《通鑑》多所載述。至於中國詩歌史上最輝煌的唐代詩歌，藉以勸諫者雖然不多，卻非完全沒有，下列即是見諸《資治通鑑》所載述者，茲簡要紹介之。

一、李日知（殘句）：「所願暫思居者逸，勿使時稱作者勞。」（卷 209）<sup>2</sup>

此詩作於唐中宗景龍三年（709），是時，中宗李顯（後改名李哲）樂於盤遊，屢與近臣宴會並令諸人歌舞為樂，後遊其女安樂公主強奪百姓莊園而築造之定昆池，又

\* 施寬文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<sup>1</sup> 疑問者如宋人劉義仲，見氏著《通鑑問疑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新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），冊 106，頁 52 中。解答者如元人馬端臨，見氏著《文獻通考·自序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，1987），冊 1，頁 3。以及明人顧炎武，見氏著《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），卷 27，頁 764。

<sup>2</sup> 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：《全唐詩·增訂本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9），卷 795，頁 9032。《全唐詩》文字與《通鑑》所載稍有不同，作：「所願暫知居者樂，無使時稱王者勞。」



命從官賦詩，李日知因作此詩以諷諫之，欲其一念原址居民曾有之安逸，勿讓時人歎息築造池園者的勞苦。其後睿宗即位，謂李日知云：「當是時，朕亦不敢言之。」《通鑑》藉以寫李日知之正直敢言。

二、李景伯〈回波辭〉：「迴波爾時酒卮。微臣職在箴規。侍宴既過三爵，喧譁竊恐非儀。」（卷 209）<sup>3</sup>

事見唐中宗景龍三年，喜遊好宴的中宗會宴侍臣，令各作回波辭，眾人多諂語以求榮祿，惟李景伯志在規勸，中宗雖不悅，大臣蕭至忠則讚美云：「此真諫官也。」李景伯存詩僅此一首，結合本事，足以讓人想其風骨。

三、聶夷中〈詠田家〉（一作〈傷田家〉）：「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前瘡，剜卻心頭肉。我願君王心，化作光明燭。不照綺羅筵，只照逃亡屋。」（卷 276）<sup>4</sup>

後唐天成四年（929），明宗李嗣源詢問宰相馮道年穀雖然豐收，不知百姓的生活是否富足，馮道除了答以「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，歲豐則傷於穀賤，豐凶皆病」，陳說農民治生之不易，又引此詩前四句云：「語雖鄙俚，曲盡田家之情狀。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苦，人主不可不知。」明宗為胡人，不識文字，遂令左右錄寫，經常諷誦以自警。唐亡之後的五代時期，戰亂頻仍、紛擾不安，惟明宗之世政治可稱「小康」（卷 278 司馬光評語），《通鑑》載錄此詩，寫明宗用以自警，既寫其心懷百姓，小康之治之所由，也希望後世人君能知道農民營生之不易。

四、戎昱〈詠史〉（一作〈和蕃〉）：「漢家青史上，計拙是和親。社稷依明主，安危託婦人。豈能將玉貌，便擬靜胡塵。地下千年骨，誰為輔佐臣。」（卷 280）<sup>5</sup>

詩見後晉天福元年（936），《通鑑》僅錄第四句。後唐大臣李崧、呂琦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叛變而向契丹求援，為求牽制，建議潞王（末帝）李從珂與契丹和親並歲贈禮幣，末帝大喜，以「忠」稱許二人。其後，末帝以其謀告訴近臣薛文遇，薛氏因誦

<sup>3</sup> 《全唐詩·增訂本》，卷 636，頁 7347。

<sup>4</sup> 《全唐詩·增訂本》，卷 101，頁 1076。

<sup>5</sup> 《全唐詩·增訂本》，卷 270，頁 3003。



此詩以諷之，末帝遂改意，且重責出謀之李崧、呂琦，群臣遂不敢復言和親之策。《通鑑》所載以詩諷諭者，多肯定其人，而薛文遇誦此詩阻止末帝和親，則實為誤國之舉。其後石敬瑭結援契丹，後唐兵敗將亡，末帝見薛文遇而欲抽刀刺之，《通鑑》雖藉李崧之口評價薛氏：「文遇小人，淺謀誤國，刺之益醜」，而末帝身為人君卻無主見，優柔寡斷，從其對李崧、呂琦與薛文遇的態度，前後反覆，可以見出。

五、羅隱〈籌筆驛〉：「拋擲南陽為主憂，北征東討盡良籌。時來天地皆同力，運去英雄不自由。千里山河輕孺子，兩朝冠劍恨譙周。唯餘巖下多情水，猶解年年傍驛流。」（卷293）<sup>6</sup>

詩見後周世宗顯德四年（957），《通鑑》僅錄第三、四句。時後周世宗柴榮親征南唐，大破南唐水陸各軍，南唐主李璟欲親自督軍，朝臣喬匡舜對此上疏切諫，南唐主將其流放，又詢問大將朱匡業、劉存忠防禦策略，未料朱匡業竟誦此詩三、四句以諷諫之，而劉存忠也在旁附和，李璟大怒，將二人分別貶謫、流放，結果最後仍不敢親上前線督戰。羅隱此詩感佩、惋惜諸葛亮鞠躬盡瘁，卻因蜀漢已無大將，以弱敵強，北伐終究無功，也感歎劉禪之無能、不肖。朱匡業援引第三、四句，蓋因南唐其時國無能臣能將，且險要之地已落敵手，安危可知；至於李璟，雖然文采出眾，卻不若其父烈祖李昇之英明雄武，能在亂世中化家為國，當其思及詩中「千里山河輕孺子」之語，想必心中另有一番羞惱的滋味吧。

<sup>6</sup> 《全唐詩·增訂本》，卷657，頁7607。

